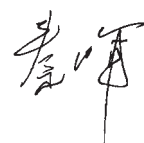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紀評論

「十月革命」百年

1917年俄國革命的歷史坐標



星移斗轉，1917年俄國革命，轉眼已經過去一個世紀了。

過去蘇聯官方關於這一革命，有個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標準的系統敘事，大意是：

1917年俄曆2月，俄國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響應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號召，發動了推翻沙皇專制的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或稱第二次俄國革命)。但是資產階級成立臨時政府，竊取了革命成果。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則成立蘇維埃與臨時政府對峙，俄國出現了無產階級的蘇維埃與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兩個政權並立」的局面。臨時政府堅持帝國主義戰爭，拒不實行土地改革，不能解決「土地與和平」兩大問題；而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又實行第二國際各黨所支持的崇尚戰爭的「社會沙文主義」路線，為人民所拋棄。於是布爾什維克領導工兵，代表蘇維埃，以工人和工農聯盟為社會基礎，於俄曆10月25日(公曆11月7日)發動工人赤衛隊和革命水兵攻打冬宮，激戰後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此即「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簡稱「十月革命」。

一 「杜馬」、「立憲會議」還是「蘇維埃」? 俄國歷史上的「二月」與「十月」

否定上述敘事的意見早就存在。1956年以後，種種質疑也逐漸在蘇聯等國家中出現，並且隨着檔案資料的公開，在蘇聯解體前後成為主流。

首先是對「二月革命」的看法。如今人們看到：「二月革命」與布爾什維克基本無關，1917年1月間長期流亡國外的列寧正值四十六歲壯年卻身在瑞士，悲嘆像自己這些「老人」也許有生之年都看不到革命了。國內其他反對派政黨也並未認真組織策劃革命。但是，俄國首相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化公為

私的警察式改革」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得罪了俄國傳統的公社農民，而斯托雷平鐵腕強權對憲政進程的「反動」又得罪了自由民主派。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身亡，對朝中的「警察式改革」派帶來沉重打擊。而正統保守派也對沙皇宮廷中異端「妖僧」拉斯普京 (Grigori Rasputin) 的亂政等醜聞感到不滿。沙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為轉移矛盾，大倡對外的強國沙文主義，積極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卻在1916年遭到慘敗。於是，「愛國」者失望怨恨，反戰者更加反皇，沙皇政權已經陷入「上下皆結怨、裏外不是人」的困境。

1916年末隨着前線戰敗，後方農村基層已是騷亂四起 (反斯托雷平的農村公社自發地收回土地進行重分)，城市也人心不穩。而在佞臣阿諛下沙皇卻不諳時局，還離開首都前去西線督戰，結果因為調度問題導致首都彼得格勒麪包一時脫銷。先是主婦上街，各界響應，當局彈壓未遂，並演變成罷工罷市，軍警不願參與鎮壓而紛紛倒戈。沙皇不知所措，杜馬 (議會) 順勢逼尼古拉二世退位，而皇族竟無人願意接位。僅僅幾天之內，擁兵上千萬、不久前還普遍得到戰時「愛國熱情」歡呼的沙皇，隨同那三百年羅曼諾夫 (Romanov) 王朝、上千年帝王江山，就這麼戲劇性地灰飛煙滅了。

蘇聯解體二十六年來，政局輿情與學界均已幾經演變，普京 (Vladimir Putin) 時代因「民主倒退」，自由派史學再度面臨壓力。但是，當年蘇共的「二月革命」官方敘事卻沒有恢復生機。不過無論這一革命由誰主導，僅就公共輿論而言，以民主取代專制的「二月革命」在蘇聯解體前後都曾經是俄國近代史上最無爭議的正面事件，而今卻面臨許多指責。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前蘇聯最重要的政治圖騰「十月革命」過去被大捧，蘇東劇變後葉利欽 (Boris Yeltsin) 時代則被大肆批評。而由於普京號召全俄「團結」，對其採取「無視」的官方態度，肯定與否定「十月革命」的官方標誌物均被禁止。阿芙樂爾艦上僅有簡單事實說明；喀琅斯塔德軍港教堂中用幾十塊黑色花崗岩石板鐫刻着波羅的海艦隊編年史，最後一筆是1917年10月5日 (「十月革命」前二十天) 波羅的海艦隊潛艇司令神秘死亡 (通常的說法是他被「革命水兵」謀殺)，後面的一系列石板都是意味深長的空白「無字碑」……

但「二月革命」不在禁忌之列。耐人尋味的是，由於俄國如今的「民主倒退」並不是要倒退回「社會主義」，而是要倒退回沙皇傳統，「二月」似乎已經取代「十月」，成為人們爭論的中心。這從俄國立法機構的名稱演變可見一斑：當初沙皇於1905年宣布立憲，建立了國家「杜馬」。但後來卻有維特 (Count Sergei Witte) 式的「反對派杜馬」(第一、二屆杜馬) 和斯托雷平式的「馴服杜馬」(第三、四屆杜馬) 之分。「二月革命」後，新政府宣布要召開多黨競爭的普選制民主立法機關——制憲議會 (通譯為「全俄立憲會議」，或簡稱「立憲會議」)，立憲會議選舉在10月布爾什維克奪權後仍然進行，選出的議會卻於1918年1月被布爾什維克武力解散，從而終結了「二月民主」。以後就只有列寧式的橡皮圖章，即所謂「蘇維埃」存在了。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議會初期仍叫蘇維埃 (並行的還有蘇聯末期出現的人民代表大會)，1993年葉利欽依據新憲法恢復了國家杜馬之稱，而且把那一年

產生的議會稱為「第五屆國家杜馬」，以示上承沙皇時代四屆杜馬立憲的法統。但是當時著名的自由民主派政黨亞博盧 (Yabloko) 就提出異議，認為新俄羅斯不應該繼承沙皇君主立憲的法統，而應該繼承「二月革命」後共和制俄國的法統，議會應沿用「立憲會議」之稱。最後達成的妥協是：「立憲會議」之名未被採納，但1995年的下屆杜馬改稱「第二屆杜馬」，又把蘇東劇變後1993年首屆杜馬改稱「第一屆杜馬」，與沙皇的四屆杜馬相區別。

於是，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產生的立憲會議，在1918年「一月劇變」以後並未成為正式的法統來源，這往往被視為民主化未完成的一個象徵。的確，俄國在「二月革命」「走出帝制」後曾經形成的一個共識就是通過立憲會議實現憲政民主。誠如高爾基 (Maxim Gorky) 所言，這是「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份子為之奮鬥的夢想」^①！「十月革命」也並未結束這個夢想。這個民主議會在1917年11月25日（俄曆1918年1月5日）下午4時由公認的民選代表召開，但翌日凌晨5時即遭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黨人強制解散，歷史上僅僅存在了13個小時。

當年毛澤東曾說：蘇聯如果變「修正主義」也不會變成美國，而是會變成「德國法西斯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②。這個說法當然不對。其實，蘇聯「修正」到了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葉利欽時代，倒是一度擺脫了「專政」，大體建立了憲政民主的政治框架。但把毛澤東的話倒過來說倒是庶幾近似：俄羅斯如果「民主倒退」，也不會更像蘇聯，而是更像沙皇時代了。普京時代並沒有給「十月革命」恢復榮耀，倒是對旨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非議愈來愈多。反共人物如索爾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把「二月」和「十月」幾乎看成一回事，認為「二月革命」要對後來列寧的上台承擔罪責，對之十分反感^③。而親共人物如卡拉-穆爾扎 (Sergey Kara-Murza) 這類「黑色布爾什維克」，既捧列寧也捧沙皇，唯獨把「二月革命」視為沙皇與列寧的共同敵人，恨得咬牙切齒。他自然也極力撇清布爾什維克與「二月革命」的關係，而把後者說成是「西方的陰謀」和自由民主派的罪過（下詳）。

在這兩種同樣大罵「二月革命」的時髦聲音面前，肯定「二月革命」開創的民主化進程而惋惜它被列寧的暴政所打斷這樣一種自由民主派的主流聲音，在蘇東劇變前後曾經很響亮，如今卻受到排斥。不過，只要對比一下卡拉-穆爾扎為列寧鎮壓「二月亂黨」叫好的主張就不難發現，自由民主派與卡拉-穆爾扎兩者雖然價值判斷截然對立，事實判斷卻大致相似：兩者都認為列寧的那一套與「二月革命」的民主方向是完全對立的，但卻完全繼承和發揚了沙皇的專制傳統。

另一方面，索爾仁尼琴在蘇聯時期開創了對極權主義體制「倒轉紅輪」式的徹底清算，直到後蘇聯時代也不改初衷。但這種清算的文化保守主義或斯拉夫主義式的，對列寧的清算被當做對「西化」的清算，最後追溯到1917年2月的民主派乃至更早的維特憲政，就像在中國清算文革一直算到了五四運動和辛亥革命頭上一樣^④。米留可夫 (Pavel N. Milyukov)、列寧和葉利欽都被看

成反斯拉夫的「西化」邪路，而斯托雷平和普京則都是扭轉邪路重振俄羅斯傳統的英雄。目前普京主要就是從這一方向尋找精神支柱。

與卡拉-穆爾扎不同，這一方向不會放棄對馬克思—列寧（據說那和民主派一樣都屬於「西化」錯誤）的否定，但對斯大林雖談不上「翻案」，卻由於斯大林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斯拉夫光榮」而多了些曖昧。我們知道，當年蘇共的「修正主義」是從批判斯大林開始的，而老祖宗列寧則不能動，借列寧來打斯大林曾經是從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直到戈爾巴喬夫的蘇聯「修正主義」標準模式。我們有些人認為如今俄羅斯對斯大林都曖昧起來，對列寧就更不會否定了，以至於今年藉中俄交好之機頻頻試探與俄方共同紀念「十月革命」。殊不知，在斯拉夫主義話語中，列寧要比斯大林的形象更糟，這與蘇共「修正主義」話語中列寧形象好於斯大林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說普京雖然沒有為斯大林翻案，但卻樂於與中國人一起以斯大林式的風格紀念二戰的勝利，那麼中國人想要與普京一起紀念「十月革命」就注定要碰釘子了。

至於一些俄共人士承襲蘇聯時期官方觀點，既肯定1917年2月的「民主革命」又肯定10月的「社會主義革命」，認為它們是歷史「進步」的前後兩個階段並且都由布爾什維克領導，這種說法作為意識形態或許還有留戀者，但是作為史學觀點，他們幾乎不可能找出布爾什維克策劃「二月革命」的例證，人們也就可以略而不提了。

二 「流水席」中的臨時政府與蘇維埃： 「主義」愈來愈接近，權爭愈來愈決裂

金雁十年前就指出，如今俄國對1917年革命的討論中心已經從「十月」轉向「二月」^⑤。不僅在價值觀上對「二月民主」的方向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斷，在事實判斷上也有更多的爭論。「二月革命」與此前主要活動於海外政治僑民中的布爾什維克沒甚麼關係，似乎爭議已經不大，但是對國內自由民主派對「二月革命」的發生起了甚麼作用，卻有明顯的歧見。在「民主倒退」中活躍起來的「保守主義史學」近年來再次復活了「民主派陰謀論」，他們的主要論點是：俄羅斯在1917年初據稱已經扭轉了敗局，有希望贏得世界大戰，所謂飢餓和麪包問題在彼得格勒造成革命前夜之說是不對的。據說，如果不是「古契柯夫（Alexander Guchkov）的陰謀」和末代沙皇的政敵存心搗亂，「成功的君主完全足以應付德國和內部問題」。而自由民主派史學當然不否認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傳播和諸如地方自治局這類新政實踐對專制制度有解構作用，但具體到2月這場「雪崩」則確實是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是麪包脫銷這場「組織不善的饑荒」成了壓垮糜爛體制的最後一根稻草^⑥。革命並非自由民主派「有組織有預謀」策劃的，但他們（而非布爾什維克）確實順勢領導了這場劇變。

「二月革命」後，憲政民主一度成為全俄社會上下的共識。尼古拉二世想禪位於皇弟時，這位親王拒絕的理由就是：俄國是否還需要君主得由普選的

立憲會議來決定。而蘇維埃批評臨時政府的重要理由，就是後者（以戰時不便為由）遲遲不舉行立憲會議選舉；甚至「十月革命」當天蘇維埃政府已經奪權後還宣稱自己是「工人和農民的臨時政府在立憲會議召開前掌握國家政權」^⑦。

由於有待立憲會議立法，「二月革命」後半年內俄國一直沒有確定國號，但即使最保守的皇室也相信過去的皇權已經一去不返，立憲會議即便保留君主，那君主也不會比憲政英國的君主更有權力。事實上由於民主共和當時深得人心，1917年9月1日，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就簽署公告，宣布俄羅斯為民主共和國^⑧。立憲會議前俄羅斯也沒有確定國歌，但臨時政府在政治場合演奏的「激進社會主義」歌曲《工人馬賽曲》通常被視為國歌^⑨。

這兩個象徵表明：「社會主義」的實踐在俄國並非從「十月革命」開始，甚至也不是僅僅從「十月革命」前的蘇維埃開始，臨時政府本身也有愈來愈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這或許可以算是索爾仁尼琴這類斯拉夫保守主義者把「二月」與「十月」一併否定的原因。

與蘇聯時期所謂「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無產階級的蘇維埃」並列對峙的說法相反，第一，「二月革命」後出現的並不是「兩個政權」；第二，在兩者並存的多半期間兩者也並不是「對峙」關係；第三，把兩者分別冠以對立的「階級」頭銜更是匪夷所思。實際上這兩者的人員有重要重疊，「主義」差異並不明顯，只是活動規則差異很大。

革命後最初並存的，其實是杜馬臨時委員會和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這兩個代議機構。兩者最初各只有十三和十五名成員^⑩，其中還有重要的重疊：蘇維埃正副主席齊赫澤（Nikolay Chkheidze）與克倫斯基同時就是杜馬臨時委員會成員。

當時這兩個代議機構的代表性都有很大缺陷：彼得格勒蘇維埃只是一個城市裏出現的機構，而且是街頭運動中非經選舉產生，作為反對專制沙皇的革命組織可以，作為民主國家的全國性議會那就差得太遠。它也並未這樣自詡，而是把盡快舉行立憲會議選舉作為訴求之一。另一方面，杜馬臨時委員會並非全體杜馬成員選出，只是由抗議沙皇解散杜馬的一批「抗命議員」站出來形成。而且1907年斯托雷平「六三政變」後，在憲政倒退的「反動時期」產生的杜馬本身的代表性就曾廣受質疑。但是，這些人的議員身份畢竟還是此前全國性競選的產物，而且臨時委員會比蘇維埃早半天產生，一產生就投身革命，成為此前群龍無首的革命實際的領導中心。它迫使沙皇退位並宣布了舊政權的垮台，連盧森堡都稱它「突然變成了一個革命機關」^⑪。這使得它很大程度上洗去了「六三杜馬」的污名。從沙皇下令解散杜馬而大批議員抗命，並反過來向沙皇叫板起，大批起義的士兵部隊就紛紛匯集到杜馬所在的塔夫利達宮，可見那時它是眾望所歸。後人說，組成蘇維埃的社會主義政黨（當時主要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囿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意識形態教條，而不去積極爭取執政，這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是當時杜馬臨時委員會的號召力確實遠在蘇維埃之上，縱使那時列寧在場，也是沒法與之抗衡的。

3月1日沙皇退位當晚，蘇維埃與杜馬臨時委員會商討成立臨時權力機構。蘇維埃方面同意在一定條件（主要就是盡快召開正式的普選制國會——立憲會議）下，由杜馬臨時委員會組織臨時政府。當時蘇維埃內部也有人提議由他們自己來組織，但鮮有響應者。因為無論由杜馬臨時委員會還是由蘇維埃來組織，都只是「臨時」政府，正式政府還是要通過全俄普選的立憲會議才能建立，這在當時是無可爭議的共識。所以蘇維埃「有條件地」支援杜馬臨時委員會組織臨時政府，其實是別無選擇的事。

在1917年2月27日至10月25日間，臨時政府和蘇維埃都在不斷改組，臨時政府連同「二月革命」中實際接管了沙皇政權的杜馬臨時委員會共有五屆，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更是成員隨時更換的「流水席」。如前所述，杜馬臨時委員會本來就包含了領導蘇維埃的齊赫澤等社會主義議員，雖然這些社會黨人因為相信當時發生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沒有立刻加入臨時政府，只想代表勞工階層監督政府並參選未來的立憲會議，因此初期兩屆臨時政府主要是自由主義黨派組成，而蘇維埃則由社會主義政黨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主導，「工兵代表」中工人也比較多。這時臨時政府與蘇維埃還可以說「主義」差異相對較大，但是兩者的關係卻相對較好，兩者都在塔夫利達宮辦公，蘇維埃並沒有向臨時政府奪權之意，反而要求臨時政府提供財政撥款維持自己的開銷，顯得像個「政府撥款設置的機構」。在戰爭問題上，臨時政府主張與「民主盟國」一道爭取打敗「德奧土保君主國」；蘇維埃雖然要求和平，反對爭取「戰勝」，但在德國進攻的情況下也主張禦敵自衛，以保護民主俄羅斯的「革命成果」——此即所謂「革命護國主義」（下詳）。

但是蘇維埃的行事規則卻與「政府」、「議會」都不同，它並不承擔「政府」的執政責任，也無意維護秩序，而作為「議會」它不但缺乏代表性，也不認為政府應當對自己負責，而是自行其是直接介入政治。當時列寧尚未回國，布爾什維克黨在蘇維埃中只有兩個不出名的代表，其中一位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yapnikov）就與另兩位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搞了個「關於軍隊民主化的1號法令」，宣布軍內各級選舉士兵委員會，控制所有武器，軍官不准持有，取消軍隊條例中等級觀念和強制性禮儀；取消軍銜稱呼；取消紀律處罰，簡化准假手續，允許穿便衣，士兵可以參加任何組織，允許隨地吸煙，免除任何形式的勞作，停止夜間點名，廢止勤務兵制度；而且讓士兵委員會控制軍官，「不能讓舊制度的支持者掌握指揮士兵的權力」等等。

施略普尼柯夫當時並未有奪權之志，很大程度上只是率性而為。這個沒讀過多少書的工人、舊禮儀教徒在「十月革命」後由於屢次加入黨內反對派（先是「工人反對派」，後是托洛茨基派）而被清洗，在正統黨史中幾乎沒有留下甚麼痕迹。但有人認為他這一手比後來列寧關於「土地」、「和平」等等的言論更厲害。這樣的「士兵民主」很快搞垮了俄軍，而在世界大戰期間搞垮俄軍，實際上也等於搞垮了俄國，並使臨時政府無法運作。但這個命令卻深得「軍心」，使不願打仗的「自由」士兵很快取代「工人階級」，成為蘇維埃的狂熱支持者。3月1日當天，蘇維埃裏就增加了十名士兵代表，以後增加得更快。蘇維

埃中的工人是每千人選一名代表，士兵中則是每連選一名，很快士兵在蘇維埃裏就成為壓倒性的多數，彼得格勒蘇維埃盛時有二千多名士兵代表，而工人代表只有五百（一說八百）多人。所謂「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基本已經變成士兵蘇維埃，更確切地說是不願打仗的逃兵蘇維埃。

但耐人尋味的是，對這種荒唐行為臨時政府居然沒有反對，實際上是接受了這種做法。剛掌權的自由主義者可能是對沙皇的軍隊缺乏信任，而後來進入臨時政府的社會主義者由於下文提到的原因，甚至對一切「常備軍」都不感興趣，更不用說列寧這樣存心鼓動亂兵奪權的人了。臨時政府不但發文承認了「士兵民主」，還下令把對抗「士兵民主」的舊軍官（如下文提到的卡列金[Alexey Kaledin]）撤職查辦。

但這並未改善臨時政府與蘇維埃的關係，相反卻使其與愈來愈成為「逃兵蘇維埃」的這個機構愈發難以相處。「士兵民主」使前線失利、後方失序的狀況無法扭轉。自由主義者無法應付，相繼辭職，原來並不想執政的社會主義黨派（包括前期蘇維埃的領導人）不得不進入政府，使得臨時政府的「社會主義」成份愈來愈濃，與蘇維埃的「主義」差異愈來愈小。臨時政府廢除了作為「普魯士式資本主義」基礎的斯托雷平土地法，承認了瓦解舊軍隊（在戰爭時期實際上也近於自掘墳墓）的「士兵民主」法令。這些都不會是「資產階級」所要求的東西。但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離開蘇維埃後的空缺愈來愈為渴望權力的布爾什維克所填補，工兵代表蘇維埃中的反戰士兵成份也愈來愈超過工人成份。這使蘇維埃和臨時政府在「主義」差異愈來愈小的同時，雙方奪權與反奪權的對立卻愈來愈尖銳。到了後期，蘇維埃從塔夫利達宮搬到斯莫爾尼宮，臨時政府則搬到冬宮，雙方在空間上也決裂了。

而列寧這時的很多主張，如最重要的土地法，實際上就是從社會革命黨那裏「照抄」的。他與這個時期臨時政府的分歧，看起來無關乎「主義」，而只關乎「主義」實施的緩急。在野的列寧唯恐天下不亂，不顧戰爭危局「馬上就要」土地、和平、立憲會議、各民族（烏克蘭、波蘭等）獨立等等；而臨時政府希望戰局穩定後召開立憲會議，通過民主立法解決這些問題。

實際上，列寧上台後雖然不等立憲會議，立刻通過了土地法，但布爾什維克與中共不同，它在鄉村毫無基礎，根本不可能搞甚麼「打土豪分田地」。而俄國農民也不同於已在土地私有制下生存了兩千年的中國農民，他們本是公社成員，面對並非來自民間購買、繼承的私有土地，而是從1861、1907年兩次「警察式私有化」中化公為私的地產，他們的仇恨並不需要誰來發動。農民依靠傳統農村公社自發地驅逐地主、收回斯托雷平改革產生的私有土地，這一過程在1916年底就已開始，到1918年春布爾什維克在各地掌權時，「自發土改」已經基本完成。換言之，誰以復興村社的方式解決了土地問題？既不是臨時政府，也不是列寧政府，而是農民自己。列寧政權不過是承認了農民的行動，而社會革命黨佔多數的立憲會議如果不被驅散，其實也會承認的（如前所述，那個土地法本來就是社會革命黨搞的）。後來，列寧政權派人下鄉組織貧農委員會大搞「階級鬥爭」，那是為了推行餘糧收集制，並不是為了土改。

至於和平，更不是俄國單方面可以實現的。蘇俄後來到1918年3月以割讓近半壁江山為代價才退出了大戰，此舉就是在布爾什維克內部也異議極大，社會上更是罵聲四起，使得簽訂《布列斯特和約》(*Treaties of Brest-Litovsk*)的「恥辱」與廢除立憲會議的霸道一起成為結束「蘇維埃凱歌行進時期」、轉入大規模內戰的艱苦歲月的兩大主因之一。顯然，這個條約並未給俄國帶來和平，只是使「外戰」變成了更加殘酷的內戰。

但就是在俄國屈服的情況下，德奧陣營還是在幾個月後就戰敗了。可以想見如果俄繼續參戰，德奧戰敗、大戰結束只會更快。這樣講並不是從價值觀上否定盡快罷戰的努力，但從事實上講這一努力成效其實很小。實際上，臨時政府遲遲穩定不了局勢主要就是因為適逢戰亂，而不是它犯了甚麼不可饒恕的錯誤。沒有大戰，沙皇不一定倒台；倒台後如果大戰結束，臨時政府也有可能站穩腳跟並發展為立憲會議下的民主俄國。而列寧奪權後同樣面臨大戰，大戰如果比實際再晚一年結束，《布列斯特和約》難以說廢就廢，列寧政權也就難以堅持下來。筆者後面要說，從宏觀看，1918年前後世界這波民主潮大多預後不良，失敗的並非僅僅一個俄國。但是從俄國國內而言，民主失敗造就的是列寧政權而非其他，確實不能說是「歷史的必然」。除了列寧的政治手腕確實老辣外，他的「命運」也特別好，大戰在有利於他時爆發並延續，而在不利於他時結束。這與他的「和平」主張其實沒甚麼關係。

至於立憲會議、帝俄各民族獨立等等，這就與後面講的「士兵民主」一樣，都是可以翻雲覆雨的東西。列寧在野時拼命鼓吹、馬上就要，而且以不立刻這樣做者為大罪，一旦自己執政了就拼命打壓，以這樣做者為「反革命」。這就更難說是「主義」問題了。有人至今還背誦意識形態說：列寧這樣做是與時俱進，面對沙皇專制要搞「民主革命」，一旦自己掌權，革命就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要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對付「民主反革命」了^⑩。其實哪裏用得着那麼多意識形態標籤？中國歷史上許多朝代的太祖皇帝往往造反起家，登基了就鎮壓別人造反，不就是那麼回事嗎？難道他們也是與時俱進的列寧主義者？

三 「凱歌行進」如何變成大規模內戰

顯然，「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尤其是後幾屆臨時政府，「社會主義」色彩是很濃的，被稱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實在莫名其妙。但這時的「社會主義」並非列寧主義，它更近似於第二國際時代所解釋的、後來凡爾賽體系下歐洲一系列民主國家新興左派政權（如1918年掌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18至1921年間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和1917/1921年後的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等）的主張，它與憲政民主是不矛盾的。而這種狀態在10月25日「冬宮之夜」也並沒有結束。無論對列寧奪權贊成還是反對（贊成的顯然不多，但堅決抵抗的也很少），當時一般人都沒把「工人和農民的臨時政府在立憲會議召開前掌握國家政權」看得多重要，都在等着立憲會議決定俄國的未來。直到1918年1月5日，

布爾什維克在其掌權下組織的立憲會議選舉遭到慘敗後惱羞成怒，武力驅散立憲會議，並開槍屠殺支持立憲會議的示威群眾（主要是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獲勝的社會革命黨等左派支持者）^⑬。

至此「二月革命」開創的民主方向中斷，俄國歷史又一次發生嚴重轉折，「數人頭」的民主規則變成了「砍人頭」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大規模內戰也隨之爆發。最近，葉攀在報刊與網上發布大批判文章，說我們關於列寧政權初期未遭遇嚴重抵抗、大規模內戰發生於立憲會議被驅散以後的說法是「謊言」，並「旁徵博引」了一堆眾所周知的事情，如「十月奪權」後克倫斯基曾試圖組織反撲、奪權在莫斯科遭遇的抵抗也比彼得格勒激烈些，解散立憲會議前頓河等地已經發生哥薩克叛亂等等^⑭。

其實，俄國因戰爭失利觸發國內危機後，早在1916年冬基層騷亂已經劇增，下文將要提及的卡拉-穆爾扎等人就是據此宣稱俄國當時實際已經發生「內戰」。臨時政府頒布「士兵民主」法令後俄軍趨於解體，「士兵民主」以致隨意譁變槍斃軍官和軍官不得不彈壓亂兵的現象到處出現。整個臨時政府時期俄國都並不安定，暴力事件不斷，否則臨時政府本身也不會八個月內五次更迭。所謂「七月危機」、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叛亂等都在這個時期發生。葉攀引以為據的頓河哥薩克卡列金叛亂也不是「十月革命」後才「發動」的。與多數俄軍將領不同，卡列金從未認可「二月革命」，此前就抗拒臨時政府的「士兵民主」而被臨時政府罷免，但他拒不卸職，反而支持科爾尼洛夫作亂，因而早在1917年9月1日就遭到臨時政府的通緝。只因此時臨時政府已經自顧不暇，才不了了之^⑮。

但是這一切都還並不影響大局。儘管臨時政府沒能結束混亂，布爾什維克「十月奪權」更不得人心，在彼得格勒與莫斯科都遇到一些抵抗當然不奇怪，筆者過去也都論述過這些抵抗。但是在這個時期，主張與布爾什維克武力相拼的人與贊成布爾什維克奪權的人同樣極少，所以抵抗規模不大。對布爾什維克政變奪權不滿、但寄希望於立憲會議，是1917年10月至次年1月俄國社會的主流情緒。這也符合列寧的一個著名說法，即「十月革命」後到次年春的一段時間是「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用主流工具書的說法就是「俄國遼闊的國土上不流血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過程到處迅速出現」，反抗只是輕微的^⑯。然而，自稱列寧主義者的葉攀卻「故意隱瞞」了列寧的這個重要分期。

其實列寧的描述本是常識。就以葉攀舉例的頓河哥薩克叛亂來說，史稱「十月革命後的頭幾個月，反布爾什維克部隊沒有重大的社會支持，他們在哥薩克地區組織抵抗的企圖較弱」。卡列金能招徠的部眾只有上千人，根本無力掀起大浪，以致他很快就絕望而自殺。當時「大部分戰鬥都是零星的」^⑰，大規模的哥薩克反叛還是後來的事。

在立憲會議被驅散前，布爾什維克甚至還沒有組建紅軍，而且還在復員軍隊，繼續鼓吹他們過去藉以搞垮臨時政府的「士兵民主」（臨時政府在「左」的方面也僅次於布爾什維克，所以這個政府也頒布「士兵民主」法令，把自己搞垮了）。原來，歐洲左派傳統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傳統歷來有不要「人

民武裝」、只要「武裝人民」的主張^⑩。馬克思大為讚賞的巴黎公社「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措施，曾經被渲染為只「打碎」「資產階級的」軍隊、監獄等等，卻要建立更嚴厲的「無產階級」軍隊、監獄等等「專政機器」。其實這完全是曲解，只要看看原文就知道，馬克思所謂「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廢除常備軍」而把槍發給老百姓——請注意：馬克思講的決不是廢除「資產階級常備軍」而建立「無產階級常備軍」。

廢除常備軍的思想早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就見端倪。這並不是指用一支「為人民服務」的軍隊來代替為國王、權貴或某個利益集團服務的軍隊，而是指廢除常備軍這種軍事安排本身，也就是廢除那種國家只允許一些特定的人(軍人)持有武器、而其他人不能持有，從而形成軍人與平民分離的制度。

古希臘民主城邦和羅馬共和國都是全體公民有權製備武器，國家並無專門的軍隊，更不會建立防備本國公民冒犯統治者的軍隊。如有外敵，則經民主決定宣戰，國家徵召武裝的公民上陣，打完仗就各回各家(巴黎公社的「國民自衛軍」就是這樣的)。古代民主制滅亡後才有了維護統治者的職業軍隊。而近代民主派(尤其是左派)則要求復興古代的公民兵傳統，廢除政府的暴力壟斷。但實際上，除了瑞士實行了這種類似古代的公民兵制度而不再有軍隊、英屬北美殖民地的武裝居民(民兵)成為美國獨立戰爭中的「革命先鋒」並因而保留了公民持槍權傳統(當然後來也另有正式的軍隊)外，近代即便是民主國家也極少這樣做的。

而十九世紀的工人運動，尤其是馬克思這一派，作為激進的民主派把「廢除常備軍」的思想大為提升，使其在「國際」及其各黨的綱領性話語中屢見不鮮。如馬克思1866年為第一國際起草的文件就說：「龐大的常備軍對生產的毀滅性影響，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我們建議普遍武裝人民並進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訓練。」^⑪1869年的《土地和勞動同盟》綱領、1875年的《哥達綱領》、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時的巴黎代表大會決議都提出了廢除常備軍的訴求。這種訴求就是指古代公民兵為原型，近代瑞士、美國在一定程度上近似的那種武裝公民制度。當時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以這些國家為例，讚賞地說：美國「除了監視印第安人的少數士兵外沒有常備軍」^⑫，「如果每個公民家裏都有一支槍和50發子彈，還有哪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⑬星移斗轉，今天美國更強調公民持槍權的是「右派」，而「左派」則主張嚴格控槍，但在1917年以前卻是相反的。

筆者相信持槍權泛濫會導致很多弊病，民主制度下的軍隊國家化即可防止統治者以軍謀私鎮壓人民，以武裝公民來取代軍隊並不可行也不必要——但那是另一個問題，就思想史而言，當時馬克思確實就是這麼主張的。「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至少其中的左派，對「常備軍」也持有很深的不信任，雖然在世界大戰的背景下沒人敢廢除軍隊，但發動「士兵民主」即體現了這種不信任。而武裝公民則受到承認，即便「七月危機」後臨時政府與布爾什維克已走向敵對，臨時政府仍然沒有取締布爾什維克影響下的民兵(即所謂「赤衛隊」)，後來在科爾尼洛夫事件中更放手讓這些民兵去抗擊「常備軍」，從而為

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奪權」造成可能。而布爾什維克更是激進，「十月革命」後正是根據以武裝公民取代軍隊的觀念，蘇維埃政權一度着手解散軍隊，復員官兵，只保留民兵性質的赤衛隊。列寧當然不是甚麼「和平主義者」，更不是完全忠實於馬克思說教的「教條主義者」，但如果只是對付「凱歌行進」時期遇到的那種反抗，諸如冬宮裏的婦女營、士官生乃至塔夫利達宮外那些手無寸鐵的示威工人，靠那些民兵和潰逃亂兵（「反戰」的「民主士兵」）來進行鎮壓確實也夠了。

真正的劇變仍然是在1918年1月驅散立憲會議後。塔夫利達宮前的屠殺發生僅十天後，隨着「數人頭」的政治變成「砍人頭」政治，蘇俄頒布了《組建工農紅軍的法令》，這個法令仍然把紅軍定義為臨時性軍隊，並許諾「在不久的將來實行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②。然而事實很快證明這完全是騙人的話。金雁十年前提到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直言：「紅軍的組織原則……跟沙皇軍隊的組織原則非常相似」^③，而實際上前者比後者更嚴厲，包括推行殘酷的人質法和什一法。紅軍的來源恢復了強制徵兵，紅軍的軍官這時起用的也基本上是沙俄的舊軍官，「士兵民主」被嚴禁，「革命」時士兵可以「民主決定」槍斃軍官，現在又恢復為軍官（通常就是舊軍官）可以「軍法從事」槍斃士兵。當然「政委」又可以槍斃軍官——只有這可以說是紅軍的創造。當時的「政委」其實主要不是做甚麼宣傳主義的思想工作，而就是布爾什維克派出的監軍，在人質法、連坐法之外又派個人緊盯着你，言行有異就格殺勿論。沙皇時代當然沒有這樣的做法，但這樣做背離「革命」的「初心」顯然比沙皇那一套還要走得遠。能夠槍斃軍官的「政委」，槍斃士兵更不在話下，「士兵民主」的美夢更是連根鏟除了。

在當時嚴酷的戰爭中，這種做法也許是生存所需，成王敗寇無需苛評。但也不必扯到甚麼「主義」上去。真要講「主義」，如上所述馬克思誇獎巴黎公社「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重要的含義就是廢除常備軍，提倡公民持槍。如果這意味着「無產階級專政」，那蘇俄豈不是從來沒有過「無產階級專政」，而美國源自殖民地時代民兵抗英傳統的公民持槍權反倒更近於「無產階級專政」了？

四 「二月革命」鼓舞了中國的民主派，而「十月革命」一度打懵了陳獨秀

1917年2月民主革命推翻專制，次年1月民主實踐的徹底失敗，是這個時期俄國最驚人震世的兩件事。而「十月奪權」只是臨時政府的尾聲、走向「一月劇變」的重要步驟。這在中國人的反應中也看得很清楚。

在《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一書中，筆者曾根據金觀濤的詞頻統計指出，新文化激進派對「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反應有相當長的時間差，乃至可以說並不是「一聲炮響」使他們變得更加激進，而是他們先變得更加激進，然後才聽進去了這「一聲炮響」。以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分析其中緣由。

「南陳北李」是新文化運動中引進列寧主義的兩大代表。但其實，他們接觸「社會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都在「十月革命」之前很久——主要是受河上肇等日本思想家的影響。而在「十月革命」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對這「一聲炮響」的反應卻很遲鈍。其中，李大釗的反應算是最快，他在1918年7月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時距「一聲炮響」已有八個月之久。此文雖對俄國革命（他其實並沒有區分「二月」與「十月」）很讚美，卻是基於「文明論」的理據：一謂俄國曾受蒙古蹂躪，開化晚於英法，文明正在「長育」，故有創新能力，不似英法文明先進得已經「熟爛」，反而不易變異了；二謂「俄羅斯精神於東西二文明之間，為二者之媒介」，故國人應當關注²⁹。這種「文明論」並非馬列主義的話語，它其實來自日本（具體就是來自福澤諭吉），而且在新文化運動前期就十分流行。

時至1919年初，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³⁰才被後來的官史認為是「十月革命」後「中國最早的馬列主義文獻」，而這已經是「十月革命」發生一年多以後。但實際上，李大釗於1913至1916年間留日時就受河上肇影響關注馬克思學說，這卻不是涅瓦河上那「一聲炮響」送來的。事實上，即便就是一年多以後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兩篇文章，雖然頌揚了「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但仍然很難說就是引進了列寧主張。有研究者望文生義指出，此二文皆為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勝利時的演講，二文標題的隱含主語並非「十月革命」，而是「歐戰」，是說「一戰」之勝是「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³¹。

從列寧的觀點看，這樣的命題實令人啼笑皆非，因為列寧不會認為這場「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值得慶祝。一貫主張「使本國失敗」、與德國握手言和、而與戰勝者協約國翻了臉的列寧，怎麼會把一戰的勝利當成自己的勝利呢？倒是與中國都參加了協約國一方的日本，包括日本的左派在內，當時也在慶祝一戰的勝利。所以，李大釗當時的立場固然是左派的、親列寧的，但與其說這類似俄國左派或布爾什維克的立場，毋寧說更像是日本左派的立場。

李大釗如此，陳獨秀對「一聲炮響」的認同則更晚，他對「十月革命」的初次反應是在1919年4月20日的《每週評論》上發表〈隨感錄〉，其中有幾句話論及「俄羅斯的社會革命」，而這篇文章主要並不是談俄國的事，那幾句話雖有肯定之意，但話題卻是「英美兩國有承認俄羅斯布爾札維克政府的消息」³²，顯然直到這時（巴黎和會正在進行，令人失望的結果尚未出現），他對俄國革命的看法基本上還是受英美影響，而那時已經是「一聲炮響」過後一年有半了。

那麼，俄國革命「一聲炮響」立即引起中國先進人士熱烈呼應的事，到底有沒有呢？其實是有的。但那不是「十月革命」，而正是推翻沙皇、宣布民主共和的「二月革命」。陳獨秀對這一革命可謂反應敏捷，革命後幾乎是第一時間，他就發表了〈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一文予以大聲讚揚。耐人尋味的是：陳獨秀大讚的主要理由，居然是他認為歐戰關係到「君主主義與民主主義之消長，侵略主義與人道主義之消長」。在那時的他看來，協約國代表民主與人道，是正義的；同盟國代表君主與侵略，是反動的。所以協約國方面的

一切變革之好壞，皆以是否有利於打敗同盟國君主為標準。陳獨秀分析道：以往協約國列強中唯一非民主的俄國作戰不力，都是因為君主制俄國「親德派舊政府」與民主制的英法等盟國不能真正協力，反德三心二意。而今俄國人已經起來推翻了沙皇，革命後的民主俄國顯然會更堅定地與其他民主盟國團結一致「與德意志戰」，而絕不會「與代表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德意志單獨言和」²⁸。蓋因當時頗有人認為俄國發生內亂會影響對德作戰，陳獨秀此文即為駁斥此說而寫。

但是，如果說1917年「二月革命」後俄國民主派臨時政府的確有類似陳獨秀的想法（即所謂「革命護國主義」²⁹），「十月革命」卻恰恰粉碎了他的預期：這是一場直接針對「革命護國主義」的革命。極端反戰的列寧推翻了民主俄國的臨時政府，並很快拋棄了「進步」的協約國盟友，簽下《布列斯特和約》，以割讓半壁江山為代價與「反動的」德國「單獨言和」了！在頗長一段時間，陳獨秀對此的錯愕和震驚是可以想見的，以至於他遲遲轉不過彎來，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裏都對俄國的事態保持沉默。有人認為他這時對布爾什維主義有「防遏」之心，對那「一聲炮響」比李大釗、甚至比蔡元培都更疑惑，這是不無道理的³⁰。

顯然，民主派陳獨秀對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立即就有了共鳴。但布爾什維克上台有何意義，他是很久以後才認定的。一般認為，這與巴黎和會使他對協約國失望有關。但有研究認為，更重要的是1920年他身邊有個由留日的施存統、周佛海組成的「日本小組」，為他譯介了大量日本左派介紹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直接從俄國人，而是從日本人那裏接受「十月革命」的。所以陳獨秀傳記作者唐寶林謂之「東方吹來十月的風」³¹。

五 「黑色布爾什維克」的「二月革命」解讀

蘇東劇變後，除了自由民主派以外，蘇東各國還出現了從傳統保守立場抨擊自由民主的極右勢力，以及熔極左極右為一爐、無條件歌頌一切專制、攻擊一切民主的人。於是俄羅斯出現了「黑色左派」、「極右布爾什維主義」和「極左保守主義」。近年來被介紹到中國的卡拉－穆爾扎³²就是一個典型。此人主張恢復蘇聯，狂熱地為斯大林的一切（包括殺人如麻的大清洗）辯護。他認為人民本是一群不辨是非的傻瓜，只要信息一開放，就會被西方進行「意識控制」，因此決不能搞甚麼「公開性」和思想言論自由。而要「減少聯繫」、「清除雜音」，以鎮壓手段來管制思想。他公開宣稱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的民主都是萬惡之源，而無論沙皇還是列寧的專制都是偉大人物強迫群氓接受恩賜「幸福」的必要條件。為此他在為斯大林暴政辯護的同時，也放言猛批過去蘇聯時代的教條主義歷史觀。

他認為俄國歷史上一切獨裁者、包括屠殺左派的獨裁者都留下了抵制西方「意識控制」的偉大遺產，帝俄的「黑幫」（極右翼恐怖組織，當時是包括布

爾什維克在內的所有左派的公敵)是堅定的「愛國者」。卡拉-穆爾扎要人們別相信「蘇聯時期的辭典對黑幫定義為『君主主義的劫掠組織成員』」的「神話」。在他看來,「黑幫」殺死約洛斯(G. B. Yollos)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是在保護俄羅斯,抵制西方的「意識控制」(但他們殺死布爾什維克又是在做甚麼?他們難道不想殺死列寧?),而列寧也很好,他是「開闢了通向美好生活道路的偉大活動家」^③(但是詆譏黑幫的「神話」列寧講得難道少嗎?他為甚麼就不是西方「意識控制」的幫兇呢?)

卡拉-穆爾扎尤其對蘇聯時期得到高度肯定、據說布爾什維克還起了領導作用的1917年「二月革命」嗤之以鼻。在他看來,這場推翻了沙皇、使列寧得以擺脫流亡海外狀態而回到國內的「偉大的民主革命」根本就跟1991年的蘇東劇變一樣,是西方「意識控制」造成的陰謀。「俄國的整個正常生活遭到徹底破壞乃至國家崩潰,是發生在1917年的2月。二月革命是親西方派的革命。它的真實意義在於為商業金融資本的發展掃清道路。布爾什維克根本就沒有參加二月革命。」^④是的,根據現在的研究,「布爾什維克領導二月革命」之說的確是列寧們為了摘桃子編造的「神話」。但是列寧難道不是「二月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嗎?1917年2月之前列寧被迫流亡海外已十多年,「俄國的整個正常生活」有列寧的立足之地嗎?沒有「二月民主」,列寧回得了國嗎?他又如何能「開闢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呢?

而在卡拉-穆爾扎看來,「紅幫」與「黑幫」其實是一夥的,沙皇專制與「無產階級專政」一脈相承,他們的共同敵人則是「西方」和「民主派」。俄共說葉利欽瓦解蘇聯就是要「復辟」革命前的舊俄國。卡拉-穆爾扎堅決反駁說,民主就是反俄羅斯(無論新舊),就是要「西化」;而專制制度無論紅的還是黑的,新的還是舊的,都是偉大俄羅斯的靈魂。因此「葉利欽主義無論如何也不是一種把蘇聯復辟到革命前俄國的設計方案」。相反,布爾什維克與「黑幫」才同樣是專制俄國的英勇捍衛者,「布爾什維克在十月和國內戰爭中完成的正是黑幫的遺願——恢復了俄羅斯(帝國)」^⑤。

蘇聯時期宣傳說:內戰中的白軍是「反革命」,當時還有一首宣傳歌稱:「白軍又來啦,來搞沙皇復辟啦。」而卡拉-穆爾扎很不屑地罵這種宣傳「一團糟」。他指出白軍絕大多數是民主派,就是發動「二月革命」搞垮了帝國的那些人,「白軍中的君主派與平民知識份子階層的(民主派)軍官相比為數極少,他們幾乎處於地下狀態,而且一貫受到(白方)反間諜機關的監視」。倒是「布爾什維克擔當的角色,是被二月(革命)所推翻的俄羅斯帝國的復辟者的角色,是讓帝國復活——只是在另一件外衣的掩蓋下罷了」。因此當時的內戰,既不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戰爭,也不是復辟者白軍對革命的紅軍的戰爭,而就是「二月對十月之戰」^⑥。「二月」是「民主革命」,是白軍所捍衛的;而「十月」則是帝國復辟,是列寧追求的——儘管他殘忍地殺了沙皇全家包括老幼婦孺,那也不過是羅曼諾夫王朝變成布爾什維克王朝罷了——我們不要以為說出這些話的是一個反共份子,不!卡拉-穆爾扎正是以上述言說論證列寧的偉大,他狂熱敵視的只有「民主派」。

像卡拉-穆爾扎那樣的觀點有個發展過程。1990年代首先是史學界開始肯定斯托雷平(通常這也就意味着否定「二月革命」)。主編俄國最高史學權威刊物《歷史問題》的伊斯肯德羅夫(A. A. Iskenderov)，在前蘇聯時代以研究亞非各國史成名，蘇東劇變後卻對斯托雷平大感興趣。1993年該刊的第3、5、7期和1994年第1、6期，前所未有地分五次連載了他的長文〈俄國的君主專制，改革與革命〉(後來擴展成書出版)。如果考慮到葉利欽此時政治上與議會鬧到「炮打白宮」，經濟上又在全力推進私有化，這篇長文的背景就不言而喻了。與前面提到的索爾仁尼琴類似^⑩，伊斯肯德羅夫也把斯托雷平和維特進行比較，並且明顯「褒斯貶維」。他大力稱道斯托雷平的改革業績，並認為維特的憲政只博取了清流的虛名，對俄國進步的貢獻遠不及斯托雷平^⑪。可以說，這是主流學術界大人物呼應索爾仁尼琴「褒斯貶維」的第一個重磅之作。

但是索爾仁尼琴也罷，伊斯肯德羅夫也好，他們心目中的斯托雷平是作為列寧-斯大林體制的堅定對立面而存在的。而伊斯肯德羅夫時代的「斯托雷平」葉利欽則是當時民主派和自由主義者所支持的對象，他經濟上搞私有化、政治上的「鐵腕」也是針對最高蘇維埃中的「蘇聯餘孽」而非針對民主派。當時甚至有民主派羨慕說：沙皇能用堅定的私有化改革者斯托雷平做首相(總理大臣)，而我們的葉利欽卻沒法授予蓋達爾(Yegor Gaidar)總理之權，甚至副總理都當不了。顯然那時受稱讚的「斯托雷平」只是個堅定的私有化論者，並不是民主化的反對者^⑫。而葉利欽解散舊式最高蘇維埃、建立西方議會式的國家杜馬，與其說像當年斯托雷平解散第一、二屆杜馬而弄出個「馴服杜馬」，不如說更像當年解散貴族諮詢機構而建立立法杜馬的維特。所以伊斯肯德羅夫的這篇文章並沒有受到民主派的反對，而索爾仁尼琴也沒有表示欣賞(此文開始連載時流亡二十年的索翁還未回國，他是否注意到這篇學院體的長文也不得而知)，但是後來情況又有了發展。

到了普京時代，他一手仍然要對付俄共，另一手、而且是主要的一手卻愈來愈用於對付民主派和自由主義，對付所謂的「西化」，俄國出現了明顯的「民主倒退」現象。相應地，這時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紅黑互動」模式，有些人既崇尚斯大林的鐵腕，也崇尚沙皇時代的極右鐵腕，兩種鐵腕的敵對似乎已經不是問題，只要反對民主自由、反對「西化」就好。

這時許多「紅幫」已從熱心世界大同的普世社會主義理想家變成捍衛神聖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強國論者，「黑幫」也從蘇聯時期被認作反共反左派的暴力組織而遭譴責，變成了反民主派的保皇暴力組織而受認同。甚至出現一種類似「通三統」的思想，把從極左到極右、傳統到現代的反民主反自由思想一鍋煮地加以宏揚。有些人狂熱鼓吹「恢復蘇聯」，卻一點看不起如今的俄共，其所希望的「蘇聯」已經不論左右，極權就行；只要不搞民主，哪怕是屠殺共產黨的專制也是好的，只要搞了民主，哪怕競選上台的是共產黨也是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摩爾多瓦的沃羅寧(Vladimir Voronin)不但是該國「共產黨人黨」(又譯「共產主義者黨」)的領袖，而且還是俄羅斯族，他的競選獲勝曾被俄共的報紙以〈摩爾多瓦的新領袖不是「前共產黨人」，他是「現共產黨人」〉、

〈共產黨在摩爾多瓦掌權了〉為題，歡呼為開創俄羅斯以外前加盟共和國俄羅斯族共產黨人重掌政權的先例。但就因為他認同所謂「西方式」的競選制度，而且在德涅斯特河地區問題上也堅持摩爾多瓦主權，與俄羅斯相抗爭，這位共產黨人的勝選也被說成是「西方陰謀」，是「自我顏色革命」。甚至白俄羅斯共產黨^⑩主導的反對該國盧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 強人政權的民主運動，也被扣上「西方策劃的顏色革命」的帽子。

發展到如今，類似卡拉－穆爾扎這類說不清是左還是右、激進還是保守的反民主反憲政主張確實「其道不孤」。最近在烏克蘭東部搞「武裝鬥爭」的兩個俄羅斯背景的政治派別「新俄羅斯黨」和「國家布爾什維克黨」就持這種主張。他們既崇拜斯大林，也崇拜斯托雷平，但似乎既不要社會主義，也不要自由主義。崇拜斯大林是因為他敢於殺「自由主義者」，崇拜斯托雷平是因為他敢於殺「社會主義者」。到了這一步，就連普京都得防他們三分，不敢像支持克里米亞屬俄派那樣全力扶植他們了。

而普京雖然也被卡拉－穆爾扎們看好，但倒是不會像他們那樣歌頌列寧，包括在中國大陸受到熱捧的那篇關於克里米亞「回歸」的「3.18」杜馬演講，凡是提到共產黨的地方都是否定的：從1918年列寧「把俄羅斯的大片土地劃給烏克蘭」，到斯大林「三十年代在烏克蘭大鎮壓欠了債」，再到赫魯曉夫為了「還債」，不經民意「把俄羅斯的克里米亞私相授受給烏克蘭」^⑪。在多黨制下還要對付反對黨俄共的普京很清楚，他只能標榜繼承斯托雷平，而不能標榜繼承列寧。

平心而論，以我們的標準看，俄羅斯今天所謂的「民主倒退」並沒有那麼厲害，這僅憑當前俄羅斯輿論中關於烏克蘭這一敏感話題的言論比我們這裏還是要明顯多元，甚至萬人規模的聲援烏克蘭的集會遊行都可以在莫斯科舉行就可以看出。但就趨勢而論，向「黑幫」的方向退和向「紅幫」的方向退，其危險性會有甚麼本質不同嗎？至少在卡拉－穆爾扎這樣的人看來似乎是沒甚麼區別的。

六 「第二波民主化」的教訓

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曾經有著名的「三波民主化」之說。他說的「第二波」是指二戰後非殖民化運動中出現的民主獨立國家，但是這個「第二波」其實名不副實。因為除了印度等少數國家，非殖民化與民主其實沒有多大關係。但1918年前後，世界上五大帝國 (清帝國、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和土耳其奧斯曼帝國) 在短短數年中幾乎同步崩潰，其廢墟上出現的國家起初基本都實行憲政。甚至一戰，後來按列寧的說法被稱為不義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在當時像俄國的「革命護國主義者」和中國的陳獨秀那樣，認為是協約國「民主陣營」與同盟國「君主陣營」之戰的人其實不少，尤其在俄國「二月革命」把協約國列強中唯一「例外」的君主國一度變成民主國時更是如此。凡

爾賽體系下歐洲出現的新國家，最初也不是共和國就是君主立憲國。所以這才是世界範圍內真正的「第二波民主化」。

然而，這波民主化的結果卻很令人失望。這些新興民主國家或憲政國家，後來少數變成了「左派」極權，多數變成了「右派」極權或威權，真正存活下來的民主體制沒有幾個。

俄國的1917年正是這波民主化的象徵。「二月革命」後的俄國曾被看做是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國家，但不幸也是民主失敗最快的國家，這就是1918年的「一月劇變」。俄國的這一進程並非偶然，它應該放在這個歷史背景下來解剖。1917年俄國革命曾經被認為具有普世的意義，但今天很多人（他們對「十月革命」和普世價值的態度可能大相逕庭）卻只把它視為「普世價值」的敵人，他們愈來愈強調這場革命的俄羅斯或斯拉夫「特殊文化」背景——不是把它當做「獨特的俄羅斯思想」的果實來讚揚，就是把它斥為「俄羅斯傳統劣根性」的體現而斥責。

俄羅斯傳統的特殊因素當然是應該考慮的。但是1911至1918年間東西方五大帝國幾乎同時崩潰而出現民主憲政的實踐，到1930年代大多數這些實踐又次第受挫失敗，導致打着不同「左右」招牌的極權主義在世界各地興起——這無疑是個世界性現象，顯然不是某種特殊文化所能解釋的。應該說，「第二波民主化」的興起和退潮，迄今沒有得到完美的解釋。過去普世主義的「社會階段」論如今已經信者不多，但回到特殊主義的「文化類型」說難道就是出路？如前所述，當時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都出現了「走出帝制」的過程，但是除了個別國家外，它們接着都深陷「轉型危機」。到二戰前，這一波國家的民主幾乎都出現了逆轉。甚至一些在中世紀都沒有專制傳統的國家，比如波蘭中世紀就是實行所謂自由選王制、貴族共和國的，但是在兩次大戰間仍然出現了帶有很濃獨裁性質的薩納奇（Sanacja）體制。還有些民族古代有專制但從沒那麼瘋狂，例如號稱理性民族的德國人，則不但重陷於專制，還陷入從未有過的癡狂。當時沒有發生「民主失敗」的似乎只有捷克斯洛伐克，而捷克民主最後也因為外部原因，被希特勒佔領而消失了。同時，中國辛亥以後的憲政實驗也遭到嚴重的挫折，這顯然也不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無論是「劣根性」還是「優根性」）能夠解釋的。

顯然，「第二波民主化」的潮起潮落，對於後來的「第三波民主化」迄今為止取得的成功和如今面臨的愈來愈大的挑戰，都具有極大的參照意義。而俄國在這些帝國中人口僅次於中國，國際地位則遠在當時的中國之上，屬於挾勢崛起的「列強」。它的民主化成敗，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仍有極大的啟示和警示意義。

列寧的上台，過去多以「十月革命」著稱，並因其被視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起點而一向被認為是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而1991年蘇聯終於解體，蘇東劇變宣告完成，又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全面失敗。當時日裔學者福山曾有「歷史終結」之語，他的意思當然不是說人類歷史終結了，而是說人類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實驗就此終結了。實際上，那時很多不同立場的學者作為事

實判斷都有類似的看法。如在福山之前，金觀濤就有「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說^①。而歐洲著名的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則把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間稱之為「短的二十世紀」，亦即作為社會主義變革的世紀。霍布斯鮑姆對這個世紀之「短」心懷左派的遺憾，與福山歡呼的口吻形成對比，但事實判斷卻是差不多的。

蘇聯解體二十六年了，無論是當初為之歡呼者還是為之痛心者的心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福山近年的言論早已沒有了當年的樂觀，而是愈來愈憂心忡忡。相反，「中國的崛起」卻給了一些厭惡「資本主義」者以很大希望。儘管與中國官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解釋不同，從「亞當斯密在北京」到「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國以外的左派和右派相信「中國模式」還是一種社會主義模式的人並不多。這個貧富分化嚴重、基尼系數高於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巨人以「血汗工廠打敗福利國家」的驚人「競爭力」崛起，能否給馬克思的理想帶來新的生命力尚未可知，但它對「資本主義」西方的挑戰卻無疑愈來愈明顯。然而，正如「第二波民主化」退潮的後果所顯示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受挫並非就是「社會主義」的福音，把「第三波民主化」視為資本主義的勝利固然是福山的淺薄，但這一波如果退潮難道就是「左派」的福音麼？卡拉-穆爾扎的「紅黑一體」與我們這裏的「通三統」同樣耐人尋味。人類對自由與平等的追求其實起源甚古，自由優先與平等優先（姑且把這二者視為廣義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博弈也不是1917年才開始，當然也不會在1991年結束。但這種博弈是以「數人頭」還是以「砍人頭」的方式進行，才是歷史進步的真正坐標。從這個角度講，二十世紀並不真正那麼「短」，而1917年的那些事，也遠遠沒有畫上句號。

註釋

- ① 參見金雁：〈讀不懂的高爾基〉，載《火鳳凰與貓頭鷹》（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113-19；蘇文：〈讀不懂高爾基〉，《書屋》，1999年第2期，頁25-28。
- ② 毛澤東：〈在計委領導小組匯報時的一些插話〉（1964年5月11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丁本，頁496。轉引自矢吹晉編譯：《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を語る》（東京：現代評論社，1975），頁256。
- ③ 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著，何茂正等譯：《紅輪》，第三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
- ④⑤ 參見金雁、秦暉：〈「流血的星期日」之後：20世紀初俄國的「維特選擇」和「斯托雷平=列寧選擇」〉上、下，《領導者》，2014年8月號、10月號，頁71-87、55-73。
- ⑥ 金雁：〈俄國有過「十月革命」嗎？〉，《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7年10月號，頁4-18。
- ⑦ Борис И. Колоницкий, "Плохо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1 April 2017), Скепсис, http://sceptis.net/library/id_3790.html.
- ⑧ James Bunyan and Harold H. Fish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132.

⑧ 公告原件見俄羅斯網上檔案，參見Александр Керенский и Александр Зарудный, “‘От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браще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и с объявлением Росси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1 September 1917),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рхив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www.rusarchives.ru/projects/statehood/07-28-rossia-respublika.shtml。

⑨ 維基百科「工人馬賽曲」中文詞條稱：「這首歌在二月革命後被俄國臨時政府定為國歌，直到十月革命後，蘇維埃俄國建立，此歌的國歌地位便被《國際歌》所取代。」（參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A%BA%E9%A6%AC%E8%B3%BD%E6%9B%B2>）但俄文詞條則稱：1917年3月2日沙皇退位後僅五天，「馬賽曲」就被臨時政府批准為國歌，起初就是用法國原來的旋律，後來配上了「激進社會主義」的歌詞並修改了旋律使之更好地匹配俄語。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則在4月4日宣布用《國際歌》為國歌，對此臨時政府只是指出，關於國歌的最後決定應由立憲會議作出（參見https://ru.wikipedia.org/wiki/%D0%A0%D0%B0%D0%B1%D0%BE%D1%87%D0%B0%D1%8F_%D0%9C%D0%B0%D1%80%D1%81%D0%B5%D0%BB%D1%8C%D0%B5%D0%B7%D0%B0）。筆者今年訪問聖彼得堡塔夫利達宮（當年臨時政府與立憲會議所在地）時看到的陳列文獻表明，當時還有《上帝保佑俄羅斯》、《自由俄羅斯頌歌》等備選草案，但無疑《工人馬賽曲》被實際運用最多。

⑩ 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最初人數有十二人與十五人二說，此處從姚海：《俄國革命：蘇聯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之說。

⑪ 中央編譯局編：《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盧森堡專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63。

⑫ 葉攀：〈「俄國式社會主義」：神話還是事實？〉，《中國圖書評論》，2016年第4期，頁82-83。

⑬ 在彼得格勒塔夫利達宮外被打死的示威者當時不同記載為7至100多人，蘇俄官方公布了21人之數。同日莫斯科也發生同樣的鎮壓示威，死亡在50人以上（Андрей А. Аргунё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191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ПСР. Собрал и снабдил примечаниями и очерком истории партии в п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ed. Mark Jansen [Amsterdam: Stichting beheer IISG, 1989], 16-17)。由於「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政黨」是立憲會議選舉的主要贏家，而且自由民主派如立憲民主黨等此前已被取締、鎮壓下去，所以抗議解散立憲會議的主要就是左派民眾與工會成員。

⑭ 葉攀：〈「俄國式社會主義」〉，頁81-90。其中內容作者用各種網名在各種網絡上傳布甚多。

⑮ 參見俄文維基百科「卡列金」詞條，https://ru.wikipedia.org/wiki/Каледин,_Алексей_Максимович。

⑯ 陳之驊主編：《蘇聯歷史詞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396。

⑰ Николай Н. Голови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в 1917-1918 гг. (Москва: Айрис-пресс, 2011), Т. 1. с.11-101.

⑱ 王建民：〈馬克思國家學說的一個重要問題——「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思想研究〉，《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9年第4期，頁9。

⑲ 馬克思 (Karl Marx)：〈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頁223。

⑳ 〈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1891年3月18日），載中央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2。

㉑ 馬克思：〈給巴黎國際聯誼節組織委員會的信〉（1887年2月26日），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頁395。

㉒ 〈人民委員會關於組建工農紅軍的法令〉（1918年1月15日），載徐天新選譯：《世界史資料叢刊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10。

- ⑳ 參見金雁：〈俄國有過「十月革命」嗎？〉，頁15；多伊徹(Isaac Deutscher)著，王國龍譯：《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頁523。
- ㉑ 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7月1日)，載《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頁101-102。
- ㉒ 發表該文的《新青年》第5卷第5號標明出版於1918年10月15日，其中卻有許多論述「一戰」勝利(一戰結束於11月11日)的文字，顯然是倒填日期，實際該期是次年1月出版的。參見朱喬森、黃真：〈關於《庶民的勝利》的發表和《Bolshevism的勝利》的寫作〉，《歷史研究》，1980年第4期，頁144。
- ㉓ 陳光裕：〈勿忘嚴謹求真，擯棄望文生義——從李大釗《庶民的勝利》等對誰而言說起〉，《歷史教學》(中學版)，2013年第12期，頁48-51。
- ㉔ 陳獨秀：〈隨感錄〉(1919年4月20日)，載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80。
- ㉕ 陳獨秀：〈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1917年4月1日)，載《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一卷，頁322。
- ㉖ 「二月革命」中的民主派，包括相當多的社會主義者，原來在反對沙皇時都是反戰派，認為沙皇與德皇爭霸而以百姓為炮灰是不義的。但是俄國經「二月革命」成為共和國後，協約國「民主陣營」與德奧土保「君主陣營」的鬥爭似乎就有了正義性。加上當時德軍正攻入俄國境內，他們認為保衛祖國就是保衛民主，保衛革命，此即「革命護國主義」。列寧一派當時堅決反對這種主張，認為「革命護國主義」與沙皇時代的愛國主義一樣「反動」。列寧發動「十月革命」推翻民主派臨時政府即以此為口實。
- ㉗ 參見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136-37。
- ㉘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頁138-39。中國改革前有著名革命歌曲《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唐寶林認為「十月的風」不是直接自俄國吹來而是經過日本中轉，故謂。
- ㉙ 俄羅斯另有一反普京的民主派活動家卡拉-穆爾扎(Vladimir V. Kara-Murza)，兩人立場相反，不可混淆。
- ㉚㉛㉜㉝ 卡拉-穆爾扎(Sergey Kara-Murza)著，徐昌翰等譯：《論意識操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855-65；870；855；871-72。
- ㉞ Ахмед А. Искендер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нархия: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я",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1 (1994), с.110.
- ㉟ http://forumspb.com/bfx-cc/system/uploads/files/site_session_attr/stenogram_en/40/23_STOLYPINS_ECONOMIC_POLICY-_IS_IT_APPLICABLE_EN.pdf.
- ㊱ 1991年蘇聯解體後原屬蘇共的白俄羅斯共產黨人成立白俄羅斯共和國共產黨(PKB)，宣稱繼承原白共的「最佳傳統」，旨在反對白俄出現「資產者統治」，所開黨代會沿襲原白共的屆數稱第三十二屆。在民主派舒什克維奇(Stanislav Shushkevich)執政時該黨就是反對黨，盧卡申科專制時期該黨認為盧走「親資產階級和反民主的專制道路」，仍對之進行抗爭，並遭到民主派執政時期所未遇的鎮壓。1996年盧卡申科策劃一些人另立花瓶黨白俄共(KPB)，PKB的活動備受打壓並在此刺激下轉向「民主社會主義」，2009年該黨改名「白俄羅斯左派黨—公平世界」。
- ㊲ 梁福龍：〈普京就克里米亞獨立並加入俄羅斯演講〉(2014年3月19日)，觀察者網，www.guancha.cn/europe/2014_03_19_214922_s.shtml。
- ㊳ 參見陳子明：〈從「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話語與思想史片論〉(2012年7月)，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http://paper.usc.cuhk.edu.hk/Details.aspx?id=8668>。